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左舜生自選集

左舜生著

近作·雜文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左舜生選集
近作集



→

民國三十一年攝於重慶
時年五十歲



←

民國三十六年任農林部部長
時攝時年五十五歲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民國四十五年攝於香港
時年六十四歲



民國四十三年春攝於台北
時年六十二歲



左舜生選集
雜文集

目錄

大陸「民主」與「反民主」的大決鬥	一
談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	一三
記留台北三週的觀感	三一
略記旅美四個月的一些實感	五三
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	一二三
旅臺一月記	一三五
日本在美化中	一七三

大陸「民主」與「反民主」的大決鬥

中共蟠踞大陸十六年，鬧了十六年，最近更鬧得烏煙瘴氣。胡鬧是一切共產黨的本質，中共不能例外，理所當然。可是他們這次的鬧，牽涉的人數之多，地域之廣，內容之複雜，却與已往任何一次不同。我們要了解他們這能鬧的嚴重性，必先了解中共當前內外的情勢，始能分析這次動亂的起因，並推測其可次的結果。

先就他們外在的情況說：

一、中共原靠蘇聯起家，毛澤東尤其強調過「一面倒」。即在中共取得大陸政權以後，

大陸「民主」與「反民主」的大決鬥

蘇聯也確曾繼續援助過中共一個很長的時期；初期中共政權之所以能漸趨穩定，居然還能高談建設，不能說與蘇援沒有關係。自然蘇方的這種援助不是沒有條件的，他們那種居高臨下的氣餒，也不無給予中共自尊心以一種刺激；不過就大體說，究竟也還沒有到絕對不能忍受的程度。即以今天的情況來看，美國對中共所以不敢採取斷然的高壓，他們所顧慮的，也還是在蘇聯而不在中共本身。單從這一點來講，說中共至今依然受着蘇聯的掩護，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赫魯曉夫比較毛澤東有常識，感覺也相當銳敏，他曾攜同若干專家，親自訪過美國，他了解美國的實力決不是一場謾罵，或幾句空空洞洞的口號，幾篇又長又臭的文章，所能對付得了；他似乎也懂得美國今天所謂資本主義，與一百年前馬克斯（一八一八—一八八三）所認識的，並不一樣；他充分了解東歐共產國家的脆弱，決不能作為他們有力的幫手，而只是他們一個沉重不堪負荷的包袱；他理會到上次大戰後西德與日本復興的突飛猛晉，足以使蘇聯有遭受東西夾擊的可能；他也懂得亞洲的共產黨（包括中共與印尼），人數雖然可觀，實力則不堪一擊。基於上述種種的事實，他乃充分認識所謂世界革命，去事實還非常遙遠，在今天就要憑着空想，幻想去盲目推進，結果一定要碰得頭破血流，粉身碎骨！赫魯曉夫把這種情形，看得明明白白，瞭如指掌，他絕對不肯把蘇聯兩億人民作為孤注一擲；他

不願眼看列寧五十年的艱難創業毀於一旦；尤其不願看見他們辛苦造成的建設基礎在美日、英德夾擊之下，化爲灰塵；而使資本主義在蘇聯這塊土地上公然復活。因此，他才毅然決然把他們的對外政策和緩下來，只希望能實現和平共存這個原則。例如三年前的古巴事件，一時美蘇間的空氣，確已充滿火藥氣味，頭一天蘇聯的代表左林，還在聯合國會場掉弄他的唇槍舌劍，大放厥辭，把美國代表史蒂文生的面孔，逼得紅一陣，白一陣，幾乎不得下台（其時我正在會場旁聽），可是當天的晚上，他們却已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斷然對美讓步。這是理智，不是衝動，也就正是他對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活用。

現在赫魯曉夫雖已退出他的崗位，但由他所代表的這一外交政策，仍由他的繼承者廣續執行，而且執行得非常有效；執行這一政策的範圍，也越推越廣。例如，現在蘇聯的當局，表示歡迎與日本合作，共同開發西伯利亞，假如日本的政治家也具有同樣氣魄，慨然接受這一邀請，由雙方簽訂五個五年到十年的計劃，使這一蘊藏豐富的廣大地區由荒涼變成沃壤，由貧瘠變成繁榮，使得這條貫通歐亞的大鐵道，減輕它的軍事價值，而加強它的經濟價值，這真是一個偉大的世界政策；不僅日蘇本身的相互威脅可根本解除，即對於人類和平共存的理想，也是最有效的一着。自然，茲事體大，真要把這一企圖見諸實行，日蘇兩方，一定各

有其先決條件，必須經過周詳的商討。合作原則首先通過，進而擬定具體計劃，也還要經過專家們精密審慎的調查與勘測。科技人員日方可以供給大部分，蘇方也可供給小部分。投資事項假如能得美國贊助，通過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運用三五十億美元，完成收益較快的第一期計劃，當不甚難。勞働力則暫時只能求之日蘇兩方，將來則北韓及我東北的耐寒人民，也未嘗不可發動。日首相佐藤有於本年繼推名外相訪蘇的傳說，果能實現，則對此一計劃，可能有所推動。假定日方所提的先決條件，包括千島領土的歸還，漁約束縛的解放，則蘇聯不僅應該欣然同意，甚至就將庫頁島南部一併歸還日本也應在所不惜。今天的日本，爲美蘇雙方所爭取，美國把日本拉得越緊，蘇聯對日本將放得越寬，日本所以取得這一左顧右盼，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這是中共一面反對「美帝」，一面又反對「赫修」的當然結果。中共又不僅反美反蘇，他們也早已反日，反英，反印，反泰，反越南，在不久的將來，他們還要反印尼，反大馬，反阿聯。他們這種的對外姿態，我無以名之，只好名之曰「過獨木橋的外交政策」(「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這是咱們湖南人最歡喜掛在嘴上的流行話，老毛也會在他的大作裏面引用過)。現在大陸一小撮自封爲無產階級的代理人高唱擁護「毛澤東思想」，我積四十年對老毛的觀察，深知毛澤東不可能有思想。他腦子裏除掉

中國幾部舊小說，幾首油腔滑調的舊詩詞，對現代一切思想學術，從未有過任何接觸；連馬克斯列寧，也僅僅得諸耳食；即他自己，也只說過「槍桿子出政權」，却從來沒有說過「槍桿子出思想」。現在的捧毛專家，一定要把這個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的金牌子鎖在他的頸子上，這等於變無爲有，變毒草爲香花，變嫖母無鹽爲西施王嬙，變牛鬼蛇神爲祥麟威鳳。即老毛自己對鏡子照照，豈不也要啞然失笑！

二、越戰打到那一天爲止，目前尚不可知，但戰事一天不停，中共對北越與越共總要支援下去。儘管美國內部不免因越戰引起相當波動，但美國政府態度迄未改變，而且增兵不已戰意甚濃，中共既不敢公然出面，但站在背後苦撐，却也大費氣力，而又無可申訴。美國雖聲言不與中共作戰，中共却不能不防，於是，構築防空設備，訓練民兵，剷掘四通八達的地下地道，準備在地下作戰，使得無限的人力、物質、金錢，一切擲諸虛化，因而生產無法增加，人民生活到底無法改善，而且一天天陷於無法生存。再加上印尼的事變，也是由中共導演的。他們在事前對印尼共黨估價過高，多方打氣，其有金錢上的資助，武器的供給（甚至連郵票也替他們改印了），自更不待說。可是印尼共黨雖號稱三百萬，但畢竟還是一個沒有成熟的果子，中共迫不及待，一定要把印共推上台去，造成東南亞一個新局面，藉以挽回越

戰的頹勢，且打擊大馬，逼走英美，而由中共取得東南亞的領導地位。不幸事與願違，不僅印尼共黨被軍方掃蕩無餘，中共在印尼一切公開與祕密的活動機構，也清除殆盡，與中共有關的華僑隨同破產，且被驅逐；中共外交人員挨打，也仍被驅逐；遭受侮辱到了這一步，可是中共的「銀樣蠟槍頭」原形畢現，除空言抗議以外，乃不能採取任何行動。

中共外交已陷於如上述的這種絕境，但毛澤東依然抱定他的拳匪思想不肯改變；他們依然要高呼世界革命，依然要反美反蘇，依然要向蘇聯問鼎之輕重，爭取共產世界的領導權！其結果，世界反共的箭頭本來全集於蘇聯的，今乃轉而全集於中共。中國一般的老百姓，可欺騙的限度很高，他們自然對這方面不會說什麼，但大陸開明分子以及中共內部若干比較有頭腦的高級幹部，深知道前路漫漫，苦悶到忍無可忍，乃非站起來說話不可。因此，我覺得大陸反毛的形勢，實以中共對外失敗為主因，其他尚在其次，不過參加反毛的人，依然要就內部的情況找題目就是了。

其次再就他們內部的情況說：

三、現在中共內部的情况，可以說是一場糊塗，過去他們對於自己的醜態，多少還要遮遮掩掩，這次他們總算把所有的遮羞布全部揭開，赤條條讓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目前解釋大陸這次動亂現象的，包括中共自身以及海外反共的人們，大率不外三派：

第一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說」。他們說：無產階級用來作為革命武器的，就是所謂「毛澤東思想」。據我看，這一派決不能說明目前大陸動亂的真象。其原因之一，便是今天在大陸大做文章來提倡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這羣傢伙，他們自身就不是無產階級，而只是冒充無產階級，混進無產階級裏面來剝削無產階級的老手。他們的第一目的在吃飯，在吃好飯；第二目的在保住一把椅子，還想爬上一把更高的椅子；第三個目的在保險，他們最怕被人指為革命對象，因此才趕忙寫出這些文章以求免死。老實說，今天真正無產階級的人們，百分之九十九，並不會寫文章，尤其不會寫這種又長又臭的文章，因為凡能寫這類長文的傢伙，全部都是由小資產階級裏面滾出來的低級知識分子。他們的見解不夠知識有限，除毛澤東的書不讀，他們如何能解釋這次動亂的原因，或進一步推測其結果？

所謂「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詞根本就不能成立，毛澤東只有：感想、空想、幻想、胡思亂想，絕對無所謂思想。假定毛澤東果有一套自成體系的思想的話，那就應該「真金不怕火」，為什麼不許別人批判呢？今天大陸反毛的開明分子，他們只反對毛澤東的行爲，並沒有涉及所謂「毛澤東思想」。老實說，在這羣開明分子的眼中，「毛澤東思想」還沒有取得

被反對的資格，更如何把它作為武器把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進行到底呢？

第二派，「中共上層分子權位爭奪說」。他們的理由是說毛澤東快要死了，中共領袖這一席，劉少奇想幹，周恩來想幹，林彪也想幹，……於是他們下面的嘍囉們便各為其主的鬧了起來，希望他們的主子得勢，他們可以雞犬登仙。這種情形不能說完全沒有，但不能說這就是亂子起來的主要原因。因為毛澤東死在眼前，乃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毛死以後，只要這個邪惡的政權不立即瓦解，他這個位子總得有人繼承。無論繼承他的人姓劉、姓周、或姓林，……甚至他們幾個人力求妥協，而產生所謂集體領導，一如他們的先進蘇聯一樣，這次的亂子並不會因此平息，而且還要繼續擴大。

據我所知，這次發難的開明分子，他們自有立場，各有其較高修養；過去對黨，各有勞績，在黨內地位也不算低；真正甘心樂意願為某一上層分子作走狗的，即有也不太多。這都可以說明所謂上層分子的權位爭奪，與這次亂子之所以起來，並無不可分的關係。

第三派，「槍桿子抬頭說」。這一說，確有事實可指，最顯著的，便是他們的「解放軍報」，已經變成了槍桿子對政治發號施令的廣播台；而且他們也會坦白的說：「大家要好好聽黨中央、毛主席的話，同時還要聽軍委、林彪同志的話」。照過去中共的習慣，他們的軍

人是不敢對政治隨便發言的，即資望在林彪之上的朱德、劉伯承之類也從來安分不敢亂說。這次這位「林彪同志」居然一躍而與他們的「毛主席」比肩，這不是槍桿子抬頭是什麼呢？可是，話仍得說回頭，這次是亂子已經起來，而且已經嚴重無法收拾，然後才不得已把槍桿子搬了出來，並不是槍桿子已經抬頭才發生這次的亂子。我們細細檢查這次開明分子所發表的文獻，他們所反對的只是毛澤東和黨的所行所為，他們並沒有對槍桿子有什麼過不去。毛澤東說過，「槍桿子出政權」，他們這個邪惡政權，本來就是由槍桿子造成的，現在他們的政權已經發生根本動搖，已經不是毛澤東這個人可能安定得了，不得已才把槍桿子抬出。這說明毛澤東的威望已經掃地，據他們揣測，可能使這班開明分子稍稍懼怕的，也便祇有這幾根槍桿子。可是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推測大陸這次的亂子一定還要擴大，也一定還要嚴重，毛澤東死了固然要亂，毛澤東不死也依然要亂；因為今天這個邪惡政權，毛澤東這個人，除槍桿子以外，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給它們以支持了，「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政權既非靠軍人支持不可，今後想更以黨，以政制軍還有什麼可能呢？

中共的軍人巨頭以數十計，正規軍號稱三百萬，民軍又好幾百萬，你以為像林彪這樣一個帶病延年中無所有的小人物，真正可以統率得了嗎？袁世凱死了，袁所哺育成長的北洋軍

閱，還在中國鬧了十幾年；毛澤東一死，他所哺育成長的這一大堆所謂「人民軍隊」，你們還怕這一羣紅色軍閥不會你爭我奪分別據爲自己的私產嗎？誰有多少槍桿子，便誰也會建立一個多大的小政權，到那時候，今天中共這個邪惡的統一政權，便告壽終正寢。到那時候，國際的白色和赤色帝國主義，各就歷史因緣與地理方便，分別對這般紅色軍閥，加以消滅與收買；到那時候，便不是一個中國或兩個中國的問題，而是十個或二十個中國的問題（但不害怕，這個時代不會太久）。

然則，上面三派都不能說明這次大陸動亂的起因，也很難得出一比較可靠的推測，你的看法又怎樣呢？我鄭重回答：大陸這次的大搏鬥，依然祇是一個「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我們不必扯上什麼無產階級資產階級，也不必扯上什麼工、農、兵、羣衆。中共政權在大陸出現還祇有十六年，中國民主思想的培育與發展，却已經有了七十年以上的歷史。在這七十多年的期間，經過孫中山、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嚴復、蔡元培、宋教仁、蔡銜、胡適、陳獨秀，……諸人的倡導鼓吹，繼以戊戌維新，辛亥革命，撲滅袁世凱帝制，張勳復辟，加上全國知識分子的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還加上全國人民，在蔣先生的領導之下，以十年之力撲滅國內軍閥，更以八年抗戰，撲滅日本軍閥等等的事實表現，民主思想已經深

入人心，民主要求已成舉國一致。中共邪惡政權一切反乎民主，當然成爲革命的對象，過去梁漱溟、張東蓀、馬寅初、周炳琳、章乃器的義不屈服；章伯鈞、羅隆基「章羅同盟」；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以及這次大陸開明分子的投袂奮起；無非都是「民主」對「反民主」的生死決鬥，也就是七十多年的民主運動所開出的花，所結出的果！

我們今後惟有高舉民主的大旗，向共匪開火，千萬不可三心二意，照毛澤東那樣去胡思亂想。必須了解無論怎樣千迴百折，中國終於要出現貨真價實的民主，然後才有一個和平統一，分治合作的現代國家出現，這是我們不可動搖的一個信念。

（原載民國五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微信新聞報）

談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

——張聞天、田漢、李達及其他

大陸對多數開明分子的高壓仍在繼續擴大中，我想起一個早被清算的張聞天，兩位正在被清算的田漢和李達，都和我有過一段關係，把我所知道他們的若干事實，在這裏談一談，也許對注意大陸問題的朋友們有些用處。

張聞天，江蘇南匯人，民國八年開始和他交往的時候，他和沈澤民（沈雁冰的弟弟）正

在南京河海工程學校讀書。「少年中國學會」成立於民國七年，我在第二年便已加入，其時我在同學黃仲蘇的南京家裏爲他的幾個妹妹和兩個小姪女補習國文。張沈兩位知道我是「少中」的會友，也許還在「少年中國」月刊和上海「時事新報」見過我的文字，因而未經任何人介紹，便一同來看我。我和他們經過幾度見面和談話，覺得他們研究的雖是河海工程，但中英文都不錯，對文學的興趣很高，對他們的印象確實不壞，因和仲蘇商量把他們介紹加入了「少中」學會。

其時，我的年齡已二十五六，張、沈還不到二十。其時「少中」有三個姓沈的會員：沈怡、沈昌、沈澤民，加上張聞天和劉仁靜，都算是我們最年青的會友。

民國九年春天，我加入了上海中華書局編譯所任新書部主任，不久張、沈在南京畢業，我便把聞天介紹進中華書局，和我同事。民九以後的幾年間，在我這一部有四個同事，後來都變了共產黨員：一、聞天，二、田漢，三、李達，四、何叔衡。關於田、李的故事，下面再談，現在先談聞天。

聞天在河校畢業後，便結了婚，而且生了一個孩子，他的太太和小孩，住在上海對面南匯的家裏。聞天進中華以後，便一直和我在哈同路民厚北里同住一房，我不會見過他回家一

次。有一天，他的太太抱着小孩子來找他，聞天立刻逼着她回去，她的眼淚一大顆一大顆落在懷裏孩子的頭上，但聞天無動於中，這可看出「五四」以後的青年，對自己婚姻不滿的態度。

當聞天和我同住的時候，他急於要找到一個新的對象，對吳淞中國公學一位四川姓文的女生，和當時一位美名噪於一時的毛小姐，他都下過不少的工夫，可是兩者皆無成就。

聞天對讀書是用功的，其時H.G. Wells的《The Outline of History》新出版，聞天便買來擺在我們臥室的書桌上，從第一頁到末了一頁，以兩星期的工餘時間，通讀了一遍。這也是「五四」以後，一部分青年急於追求新知的共有態度。

聞天和我同事的時間不太長，大致兩年左右。後來我知道他去過一次美國，但他是那一年加入共產黨的，我不知道。民國九、十年之間，我和惲代英、鄧中夏（原名康，和惲同爲「少中」會友）常在一塊，不會見過聞天參加。我和陳獨秀也有過一時期的往來，而且在他編的「嚮導」和代英編的「中國青年」上寫過稿子，也不會見聞天在這兩種刊物上有文字發表。

聞天在中華書局出版過一本中篇小說（書名已忘），我看過原稿，內容寫一個青年和他

的父親發生激烈衝突，文字非常尖銳，這可看出他當時思想的一斑。後來（時間在民國二十一年以前）國民黨的上海市黨部，曾以訓令方式，通知上海各書店，一次禁止了兩百種以上的新書，單我在中華經手出版的，也在二十種左右。聞天這本小說，和田漢的一本「咖啡店之一夜」的戲曲集，都在禁止之列。

民國十四年，我加入了青年黨；十五、六年，我又離開書局到法國去跑了一趟；從此以後，我和聞天的關係，便有一段長時間脫了節。後來我知道他到蘇聯讀了幾年書，俄國話說得很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過翻譯，後來他和陳紹禹、秦邦憲等都變成了有名的國際派，在黨內所擔任的職務，也逐漸的重要起來。

民國三十四年，我和褚輔成、黃炎培、冷通、傅斯年、章伯鈞六人同訪延安，和共方代表毛、朱、周等八人舉行了三次會談，聞天便是他們的八代表之一。其時我已五十二，聞天四十四，但他那副小孩子面孔，却和我們在上海時一樣，他和我確也談得很親熱（這是我們「少中」同人的一種風氣，無論在任何場合，我們的私人情感，總是超越黨派或政治意見之上的）。毛澤東也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他當然知道我和聞天的關係。這次他所以把聞天排在八代表之內，大概多多少少是爲了敷衍我的。會談結束，我向毛提出，說我個人要和

聞天談談，毛答：「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於是，我和任弼時一陣去會張，任係毛的親信，我和聞天談話，他便坐在旁邊，因此我們便只能敘舊，不便談政治，這也可看出毛澤東對所謂國際派，是何等的猜忌。其時聞天住的地方，非常簡陋，桌上除幾本外文書和一部電話以外，別無他物（與周恩來的住所迥然不同），同時，我也不會看見他的太太，大概一直到那時候，他還是一個光桿，我聯想到他所追求過的那位文姓女學生，和那位毛小姐，也許是因為他的眼光提得太高，不容易找到適當的對象吧，但這也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囉！

當毛澤東還在向蘇聯「一面倒」的時代，他儘管對國際派如張、陳、秦諸人非常猜忌，但表面還得敷衍，因此聞天（洛甫）會歷任要職，做過駐蘇大使、外交部副部長，一直到中共和蘇共大決裂以後，才把他凍結起來。他現在也已經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了，精神上也許很不舒服，但他與這次的大風潮，似乎沒有直接關係。

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都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其時中共有一個代表團留在重慶，周恩來任團長，指揮一切。葉劍英則為軍事代表。陳紹禹愛出風頭，對政治和社會都認識不夠，但領袖慾極強，辯才無礙，每遇着他在參政會發言，能說會道的主席汪精衛，也

只能皺皺眉頭了事。有一天，張君勳和我與蘇聯駐重慶大使鮑格莫諾夫見面，陳爲我們當翻譯，俄國話熟極而流利，我和君勳都承認他是中共一個可造的人才。可是毛澤東始終對他不敢放心，可能周恩來對他也不滿意，大致他留在參政會只有兩年，便調回了延安，據說他回延安後，一直病了好幾年，說不定已被毛軟禁。我們到延安後，想揭破這一祕密，也要求和他談談，毛不好拒絕，經過兩天，我們便見着他。其時是陽曆七月三、四號，中午延安天氣很熱，但他仍穿着棉衣褲曬太陽。據他告訴我們，他已經打過一千多針，看樣子確實有病。他住的地方比閩天的更不如，並且電話也沒有，會客的地方，除幾把椅子以外，別無他物，他的太太帶着一個小孩，面黃肌瘦，可看出他們的營養不良。現在他已經是六十九歲了，是否尙在人間，誰也不知道。他是安徽六安人。

秦邦憲情形稍好一點，仍可往來延安與重慶，但精神也不愉快，他在延安主編「解放日報」，每天午後出版一大張，我們這幾天在延安活動，都成了這張報紙的第一版材料。在一次吃飯的時候，我對他說：「您回延安後，身體胖多了。」他說：「我在這裏，只是飽食終日。」這句話充分表示他無所事事。後來他和王若飛，都是在抗戰結束時回延安，因飛機失事死了的。他是江蘇無錫人。我與李幼樁和他第一次見面在上海滄洲飯店，其時是抗戰前，

廬山談話剛剛結束以後，這一晚也有周恩來在座，我們的談話內容，是關於如何求得抗戰勝利的一點。

田漢，字壽昌，長沙人。我和他在徐特立（懋恂）創辦的長沙縣立師範同學。其時是民國元年，他十六歲，我十九歲。他大致在長沙師範讀了四年才去日本，我只讀半年便跑了。我和他朋友關係的建立，不在同學而在長沙定王台省立圖書館。這個圖書館規模不算大，但內容相當充實，藏舊書近十萬冊，善本書頗多（開辦初期，湖南著名經師皮錫瑞鹿門任過館長），清末民初出版的新書也有好幾千冊。因地點僻處東城，看報的每天有二三十人，但看書的只有四五個，遇着風風雨雨的時候，尤其是寒暑假，三間閱覽室，便幾乎被我和壽昌兩人專用。閱覽室的三面，裝着大的玻璃窗，窗外有十幾棵芭蕉，風搖葉動，夾着打在上面的雨聲，更令人神往。其時壽昌看的書已經以文學為主我還在亂看亂翻的時代。我偶然在「長沙日報」發表演文，壽昌便在第三版發表他的改良湘戲，記得他寫過一齣「新三娘教子」，以黃花崗某烈士的家庭為題材，給我的印象頗深，這是壽昌寫劇本的開始，也是我們以文字相見的開始。「長沙日報」的總編輯傅熊湘，字君劍，一字鈍根，是「南社」有名的社員之一，光緒三十二至三十四年，他在上海主編「競業旬報」，胡適之便為這本雜誌寫過稿子不

少。他能儘量把我和壽昌的稿子在報上發表，確也給了我們一種鼓勵。

我們在圖書館，有幾次看見徐特立的爸爸，六十左右，常常拿一本木版大字的陶詩，坐在閱覽室外的階簷邊上高聲朗誦，有一首我便聽也聽熟了；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植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將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有人說，此老有神經病，我看不盡然，假如，這便算是神經病，那末徐特立終日忙忙碌碌，東奔西走，向人說話，慷慨激昂，見人發起什麼事，便想進而包攬，便算是神經病之尤了。平心而論，徐特立這個人，確不失為熱心分子，毛病出在學養不優，宗旨無定，當清末請開國會運動進入高潮的時候，他便砍下兩個指頭，寫了「請開國會斷指送行」八字血書，交給當時湖南的請願代表羅傑。等到勤工儉學有人大力鼓吹，他的年齡已經四十二，便拋棄一切到法國開始學法文，還要一面做工，一面研究他所愛好的數學。回國以後，他看見共產黨已經鬧得蓬蓬勃勃，他又變了共產黨。民國三十四年我到了延安，他的高齡六十有九，我問他近來幹什麼？他說：他想把許多部門的科學如數學、物理、化學等等，編成一種綜合性的教科書。延安另有人告我，說他近來還要跳到延安河裏去洗澡。今年他已九十，據大陸報

紙記載，他依然見獵心喜，還要和莊則棟比賽幾盤乒乓哩！羅傑因爲他的斷指血書所感動，曾送過他一首七律，有兩句警句：

「指痕送別壯南八，才氣逼人求李雙。」

我承認他「才氣」確實是有一點，但微嫌太亂，外省人不大知道他，他在湖南，却是一部分青年的偶像，近年湖南的亂人出得最多，受他的影響不小，我們要懂得毛澤東，懂得田漢，便多少有了解徐特立這個人的必要。

壽昌離開了長沙師範，便到日本讀書，後來進了東京高師，在名義上儘管是繼續研究教育，但仍以搞文學爲主。他曾告我，他每次出去，總要在神田區一帶買一兩本書，遇着有好戲或好電影要看而沒有錢，便又搬幾本書去當了買票（在日本，好書是可以當錢的）。他去日本三四年，回了湖南一次，便把他的表妹，即他的未婚妻易漱瑜帶了出來，再去日本。其時已民國八年，我在南京教書，已加入「少年中國會」，他路過南京，和漱瑜一陣來看我，事前並未通知，使我喜出望外，於是我把南京的「少中」友人，以南京高師和金陵大學的學生居多，和他見了面，我還帶着他和金大的教務長劉伯明（經庶）作過一次長談，凡伯明提到的書，壽昌大抵看過，談得甚爲融洽，事後，劉伯明還常常對我恭維壽昌不置。壽昌之加

入「少中」，就在這一時期。民國九年，主持「少中」會務的王光祈去了德國，我進了上海中華書局，「少中」的會刊「少年中國」，便由我負責編輯，壽昌寫過不少的稿子，他的話劇處女作「環珮璘與薔薇」這個劇本，便在這個月刊上發表。這個時候的「少中」月刊，內容還很幼稚，但銷路不壞，平常每期銷六七千冊，出過兩期婦女問題專號，都超過一萬，黃仲蘇的妹妹後來成了武漢大學理學院長查謙的太太黃孟姒，和後來成了李達太太的王會悟，朱謙之的太太楊浚累，都在這兩期上有稿子。

壽昌有個舅舅名易象（字梅丞，一號梅園），學問不壞，曾做過湖南留日學生監督，壽昌能到日本讀書，還得了一份官費，大概得着他舅舅即他的岳父的助力不少。但後來易象捲入了湖南地方政治漩渦，在長沙爲他的政敵所殺，當軍隊包圍他的住所，拉他下樓槍斃的時候，他知道不免，還從容寫了一首絕命詩：

「天外飛來事可驚，丹心一點付浮沈，愛鄉愛國都成夢，留得來生一恨吟。」

這件事大致發生在民國十年左右，這對壽昌、漱瑜的精神上是一絕大的打擊。壽昌的母親，我在上海常見面，也是一位明白多禮的老太太，壽昌之敏而好學，大致和他的母系血統是有關的。

壽昌在東京高師畢業後全家遷往上海，我請他加入中華書局（其時張聞天已離開了）。在中華做事有一好處，即書局對我們的工作，絕對不加干涉，我們名雖編輯，大部分時間，都在利用編輯所的圖書館讀我們自己要讀的書，民國十一、二年之交，他們的圖書館，已有藏書三十萬冊，民國二十年我離開以後，已陸續加到五十萬冊。其時，我已開始研究中國近代史，中國與列強的關係史，壽昌則加緊創作劇本，並從事翻譯。他的戲曲集如「咖啡店之一夜」，翻譯的莎翁劇如「哈孟雷特」、「羅蜜歐與朱麗葉」，王爾德的劇本「莎樂美」，「日本戲曲集」等等，都在這個時候出版，書局並沒有把這些工作算在編譯所的時間以內，還是另給稿費或抽版稅的，這比較今天香港的出版家，似乎賢明得多。日本的作家如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之類到了上海，因壽昌的關係我也和他們見過面；中國方面從事文藝的人，凡與壽昌有往還的，我大抵也有過接觸；我對當時的所謂新文學能感興趣，並且知道這件事的重要，為中華書局出過許多文學部門的書，壽昌對我可說是最有影響的一個。

壽昌在中華工作，大致有三年左右，離開以後，他的文學運動，尤其是戲劇運動，便大大的展開：一面從事寫作，一面也從事實驗。壽昌與青年黨無關係，但他出過一種「南國特刊」，却附在青年黨的機關報「醒獅」出版。民國十六年，他創辦了一個「南國社」，設有

一個實驗劇場，可容納觀眾三百人左右，隨時有他自己寫的劇本上演，歐陽予倩寫的「翠屏山」，由予倩飾潘金蓮，周信芳飾武松，也在他這個劇場演過。到「南國社」不僅有好戲可看，而且有香檳、威士忌可喝（壽昌從那裏找來的錢，我却不明白，也不願明白）。結果是賓至如歸，我自然也是座上客之一，因而我認識搞文學的朋友也越來越多，「創造社」的郁達夫和他的太太王映霞，我便是第一次在「南國社」見着的。當時的王映霞是那樣美，我真為他們暗暗祝福。壽昌又不只在他的實驗劇場演戲，有時還帶着大隊人馬到南京、杭州等處上演，氣象真是活潑極了。後來唐槐秋（此君係青年黨）父女組織了一個「旅行劇團」，到處演戲，便是直接受着壽昌的影響。

壽昌對男女生活是相當浪漫的，自從民國十二年秋天易漱瑜死了以後，他續娶的一位名黃大琳，同時還有一位林蘇菲，也和他「濃得化不開」，後來這位林小姐到南洋教書去了，所有寄給壽昌的信件或食品，還是由我轉交，「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像這類的事，我總是樂於幫忙的。現在他的太太名叫安娥，我却不認識。

據說壽昌是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三）加入共產黨的，從此他和夏衍（沈端光）、陽翰笙便成了左翼話劇界和影劇界的領導人物。壽昌在抗戰前後寫過不少劇本，抗戰中，他更到

長沙、桂林、昆明等處作過演劇活動。他這個時候，名義上是在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下面負責文藝宣傳工作，但他自從「創造社」以來，便一直看郭沫若不起，因而他很少跟郭在一塊做事。當壽昌在中華書局的時候，郭還在日本讀書，曾寫過不少白話詩在「時事新報」的學燈發表，有一首可憐巴巴的表示要自殺（爲什麼我不清楚），頗能引起若干人的同情。後來郭又和「少中」會員宗白華（時任學燈編輯）有關於哥德的討論，壽昌也參加了，於是他們三人把有關這一方面的文字輯成一冊，名爲「三葉集」，在亞東圖書公司出版。可是等到白華、壽昌把他介紹進「少年中國學會」的時候，郭在四川的中學同學會琦、魏嗣鑾、李劫人等（均少中會員）却堅決反對，說他在中學時便品行不端，因而他卒未成爲「少中」會員。後來郭這一特殊的不良行爲，更大有發展，現在在台灣的張夢九，和抗戰時參加汪偽組織的傅式悅，都最清楚。壽昌之所以看郭不起，這大概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大家只知道郭叫「斯太林爺爺」、「親愛的鋼」、「永恆的太陽」……實際他的卑鄙何止如此，這次大陸大舉清算知識分子，郭首先自打耳光，以求保持這碗共產飯，在一個知道他歷史的人，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共黨蟠踞大陸以後，他們居然能用壽昌、歐陽予倩、洪深、丁燮林、夏衍、茅盾、周信

芳等領導戲劇和其他文藝工作，我總覺得用當其才，以爲共黨在這方面，或能有所發展，沒想到壽昌卒以「謝瑤環」一劇翻船；吳晗本來是搞歷史的，這次也以「海瑞罷官」的劇本奉入，真是不幸得很。以壽昌的性格來說，富有正義感而又讀書甚多，骨頭相當硬，不肯輕於妥協，尤其不拍馬屁，要和郭沫若輩爭一日之長，當然是不可能的。假定，他這次還能不氣死，不餓死，我希望他能關起門來，寫一本回憶錄，把他五十年來從事戲劇活動的艱苦經過記錄下來留贈後人，使繼起作這一活動的人有所憑藉，我想這是很有益的。

李達，湖南零陵人，現年七十五。他本來是在日本學工業的，捲入了「五四」以後的思潮，也頗留意社會科學。我原來不認識他，他回國以前忽然寄給我一部由他譯出日本人著的「社會問題總覽」，請我代他向中華接洽。我覺得他的譯稿寫得乾淨，文字清通，便接受下來，因而和他通過幾次信，出版後居然銷了好幾版。他畢業回到上海，一時找不到工作，我便把他拉入中華幫忙。他沈默寡言，看樣子很老實，做事也相當負責。但說他可以做一個大學校長，則太嫌不夠。他在中華，大致只有一年多光景。其時上海有一大羣女子，都在東跑西跑的找對象，有一名王會悟者，貌僅中人，稍解文字，略有常識，和我也有過短時期的往還。據我所知，她本來已有一個假定的目標，可惜只限於「落花有意」。會悟有一姪女，貌